

阿库乌雾汉语诗歌的现代意象研究*

叶俊莉

(西昌学院 文化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彝族学者型诗人阿库乌雾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为底蕴,借鉴西方意象诗学的理念,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塑造出众多新颖、独特、韵味深厚的意象,既表现了诗人内心的独特体验、诚挚的民族情感,又融入了诗人对现代文化精神的理性思考,体现了诗人对民族文明复归、文化繁衍的深切关照。该文从象征意象、意识流意象、变形意象等三个方面对阿库乌雾汉语诗歌的现代意象进行研究。

【关键词】阿库乌雾;汉语诗歌;象征意象;意识流意象;变形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3-0058-04

生活于当代的彝族学者型诗人阿库乌雾,既是一个用真诚心灵歌唱的才华横溢的诗歌吟唱者,又是一个努力探寻、积极实践母语文化的真切关照者,还是一个有着冷静思索与睿智眼光的民族文化复归的诗性呼唤者。于是,他的诗歌创作成为了彝族当代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研究者众矣。

综观其诗歌创作,独具特色的意象是阿库乌雾诗歌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的承载者与表现者。阿库乌雾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为底蕴,既秉承了中国传统意象诗学的主客观统一的观点,又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尤其是意象诗学)的理念和创作手法,在其汉语诗歌里塑造出众多新颖、独特、韵味深厚的意象。(阿库乌雾对中国传统意象诗学的继承与发展,本人已另有专文论述:《族群文明的深层延续——阿库乌雾汉语诗歌传统意象研究》)。本文拟对其汉语诗歌的现代意象作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与中国传统意象诗学主张“意象”是客观方面的“象”与主观方面的“意”的融合与渗透的观点不同,西方意象诗学侧重于意象的主观性^[1]。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强调意象是“想象力重新建造出来的感性形象”^{[2] (P124)},象征主义文学中意象派诗歌的代表诗人庞德在《追溯》一文中认为,意象是“在一瞬间呈现出智慧和感情的错综复杂的东西”^{[3] (P124)}。这种注重诗人主观表现的意象诗学,深深地影响了既注重诗性浪漫又善于理性思考的彝族诗人阿库乌雾。在阿库乌雾的汉语诗歌创作中,诗人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为底蕴,借鉴西方意象诗学的理念,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塑造出众多的象征意象、意识流意象、变形意象,既表现了诗人内心的独特体验、诚挚的民族情感,又融入了诗人对

现代文化精神的理性思考,体现了诗人对民族文明复归、文化繁衍的深切关照。

一、象征意象:现代文化精神的诗性探索

以波特莱尔、魏尔伦、马拉美为代表的早期象征主义以及以瓦雷里、里尔克、叶芝、艾略特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作为19世纪、20世纪西方较大的文学流派,对“五四”以后至今的中国诗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代彝族诗人阿库乌雾借鉴象征主义文学的创作理念,契合本民族的文化特性,以当代文化的多元视角,在其汉语诗歌中创造了大量的象征意象。

何为象征意象?黑格尔指出:“作为象征的形象而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由艺术创造出来的作品,一方面见出它自己的特性,另一方面显出个别事物的更深层的普遍意义而不只是展示这些个别事物本身……象征形象仿佛是一种课题,要求我们去探索它背后的内在意义。”^[4]美国学者劳·坡林认为:“象征的定义可以粗略地说成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5],可见,象征意象是具有超越自身意象内涵、暗示作者独特体验的丰富意蕴的一类意象。

阿库乌雾在《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诗歌创作论》一文中指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前卫诗人必须在艺术实践当中去努力创构一种超宗教范畴的,超宗教特性的,集民族文化精神美质与时代科学文化创造为一体的,全新的精神境界和崇高理念。”^[6]阿库乌雾的汉语诗歌创作,正是他在对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解构中,努力实现对现代文化精神的诗性探索。而象征意象所具有的丰富的象征、暗示韵味,成为诗人探索现代文化精神的主要载体。

在《神谕》一诗中,诗人用“猎枪”象征人类对自

收稿日期:2014-07-13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课题“阿库乌雾汉语诗歌的意象研究”(项目编号:YZWH1128)。

作者简介:叶俊莉(1973-),女,四川西昌人,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研究。

然生命的掠夺,在反思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同时,以“竹笛”象征人类与自然(动物)的和谐相处:“在猎物陷目的深深处/我倾听古钟的清音/或是神鼓抑抑扬扬的哽咽/奇异地令我祖传的猎枪/制造悠扬而恬和的/竹笛”。在彝族古老的牧猎文化中,人与动物、自然之间既是冲突对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的。彝族先民不得不猎取动物生命以求自身的生存与繁衍,对于自然的这种馈赠,彝人是怀了感恩之心的,于是,在“古钟的清音”与“神鼓抑抑扬扬的哽咽”中,诗人表达了彝人祈盼化“猎枪”为“竹笛”的美好愿望。这似乎是悖论的彝族先民对待自然的态度,实则体现的是纯朴的民族智慧,诗人在追溯彝族先民崇尚自然精神的同时,也是对现代文化精神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

在《雪史》一诗中,诗人用“雪人”这一意象,象征传统文化精神中彝人的民族性格,并借以实现在现代文化精神之下对民族性格的重塑:

“有一双青衫似的巨手/将一对最早的雪人/喧闹地/塑立……多么奇特的雪人呵/头上有喜鹊做窝/腰间有蜜蜂筑巢/鼻中有丝丝虫鸣唱/腋下有感别鼠奔突/脐里有吉紫鸟建巢/腿间有阿尔鸟穿梭/脚背上蚁穴如野果……多么睿智的雪人呵/那些关于你的凝重的文字/开始带着铁沉的翅膀/怎样在雪水里濯净火焰中化解/尔后与毕摩深闭的瞳孔里/悄然内聚……雪开始渗入一个民族的肌理/从此冷与暖不再分离”

诗中,“雪”的高洁、纯净、超凡脱俗与“火”的热情、奔放、厚重“悄然内聚”为“雪人”内在的品质,而这一对与“喜鹊”“蜜蜂”“虫”“觉别鼠”“吉紫鸟”“阿尔鸟”“蚁穴”融为一体的“雪人”,正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彝族先民纯朴、睿智、热情、旷达、善良的民族性格的象征。正如诗人在本诗的题记中说的:“将雪埋掉/是不可能的”,彝民族这种优良的内在性格作为集体无意识,已留存于彝族的血脉中,必将永久存留。可是,面对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现代文明对彝族文明的侵袭、彝族民众当下的生存状态等等,民族性格中优秀的品格能否依然传承下去?这令诗人内心无比忧虑,在现代社会中重塑民族性格的责任感成为诗人努力探索的动力。

在对现代文化精神的诗性探索中,对民族文化中禁锢人性发展的落后文明、特别是对彝族女性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必然地成为诗人关注的重心。在《童裙》一诗里,诗人以彝家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锅庄石”象征禁锢彝族女孩自由发展的落后文明:

“可那多产的女人/早已用语言和看不见的绳索/硬将你捆绑于那弯曲的/锅庄石/你开始属于石头的女

人/石头却更见沉默不语……谁说女人不懂得战争/你决意积水成渊/淹死天底下/所有弯曲的/锅庄石”

作为落后文明的象征,“锅庄石”以“语言”和“看不见的绳索”,将彝族女孩“捆绑”在世代居住的彝家山寨,成为家族生存、繁衍的牺牲品。更为悲哀的是,母亲自己也是“锅庄石”捆绑的对象,现在却作为“锅庄石”的帮凶,让女儿继续着彝族妇女可悲的命定的生活方式,成为母亲的继承者。诗人内心的伤痛不言而喻。值得庆幸的是,新一代的彝族妇女知道用眼泪来反抗了,“决意”用泪水“淹死天底下/所有弯曲的/锅庄石”,这样的反抗虽然是毅然决然地,但无疑也是苍白无力的。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改变彝族女孩难以走出家门的落后现状、如何在现代文化精神中探索彝族女性的地位与生命价值,是诗人长期以来一直在认真思索、探寻的一个重要课题。

阿库乌雾在《寓言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当代形态》一文中说:当代少数民族诗人应该“不可推卸地担当起全面建构本民族当代寓言的文化历史职责,而当代各民族寓言的基本要求就是首先对本民族旧有的文化传统作全面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在这基础上发出对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融为一体的新的生存精神的渴望和追求”^[6]。诗人正是在其诗歌创作中、在其象征意象的诗性创造中,身体力行地承担着作为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这一历史责任。

二、意识流意象:思情与言说的潜流

“意识流”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的,他认为人的意识分为理性意识和非理性意识,“意识本身并不表现为一些割裂的片段。象‘锁链’或‘列车’这样一些字眼并不能恰当地描述它最初所表现的状态。它并不是什么被连结起来的東西;它是在流动着的。‘河’或‘流’乃是最足以逼真地描述它的比喻。此后我们在谈到它的时候,就把它称之为思想流、意识流,或主观生活流。”^[7]詹姆斯的这一理论影响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注重人物内心活动、描写人物不受理性逻辑约束的意识感受和思维过程,成为“意识流”文学创作(主要是意识流小说)的主要特点^{[8] (P490)}。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结构看成是一个由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潜意识)组成的系统,肯定并扩大了詹姆斯“意识流”概念的范围^{[8] (P491)},这使人们对自身的心理意识的理解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扩大了“意识流”小说创作对人类意识活动进行探索与挖掘的空间。

阿库乌雾把詹姆斯及弗洛伊德关于意识流的

相关理论引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在其汉语诗歌里创造了一系列描写内心意识活动的意象,这里暂且将它们归结为“意识流意象”。这类意象是诗人感情与思想的外在体现,是诗人思情与言说的潜流。通过对其意识流意象的分析,我们能察悉诗人内心的情感与意识,从而尽量解读阿库乌雾汉语诗歌意象的深刻意蕴。

《行咒》一诗中,诗人描摹巫师行咒的语言,塑造了一组意识流意象:

“巫师把玩着语言的魔方/在日月的鼓沿上/在女人的头帕上/在扫帚的哀鸣里/在断蒿的伤痕里/面对时流面对浩宇/用低沉而悲怆的节奏/独自行咒”

这一组意象中,有具体的“日月”、“鼓沿”、“女人”、“头帕”、“扫帚”、“断蒿”、“时流”、“浩宇”等意象,也有“哀鸣”、“伤痕”、“节奏”等抽象意象。诗人的意识随着巫师的咒语纵横千里、“思接千载”^[9],从而体现诗人对彝族个体生命的生存与发展的关注,实则也可扩大到对整个人类生命的关照。从“日月的鼓沿”开始,诗人借此暗示韶华易逝、岁月无情的感叹,再以“女人的头帕”、“扫帚的哀鸣”来具体印证时光在生活琐事中的如飞而过、生命的无奈与哀伤。随着诗人意识的流动,个体生命在历史长河中、在广阔宇宙间的脆弱与无助加深了诗人内心的伤感、令其扼腕叹息,于是有了“断蒿的伤痕”这一意象的出现。随后,诗人把意象拉升到无情的“时流”、广阔的“浩宇”,这是诗人伤感的背景,也是人类个体生命难以企及的永恒存在,因之,巫师行咒的“节奏”必然是“低沉而悲怆”的了。这是诗人对当代彝族民众生存状态的深入思索,也是诗人对处于广阔时空中的人类个体生命的深切关照。

诗人在散文诗《家论》中,以一组意识流意象传达出对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摇摇欲坠的“家”的眷恋、对失落的家园的向往:

“葫芦、胎宫、堡垒、穹窿、地雷、丰乳……自古以来,家似蜂巢!……

居于城市之央的家,不速之客不绝于耳目:声之客、气之客、形之客、意念之客……蜘蛛、蜈蚣、壁虎、蚊虫、鼠害都习以为常,唯独没有灵牌,没有神龛!

迷路的祖灵

晕车的祖灵

饥饿的祖灵

并无灵性的祖灵”

诗人以意识的流动塑造了“葫芦”、“胎宫”、“堡垒”、“穹窿”、“地雷”、“丰乳”这一组意象,这是来自诗人记忆中的、彝人曾经生活其中的“家”的一组代

名词,暗示着“家”的存在要素——房屋、男人、女人、圆满。诗人对家园的无比眷恋之情跃然纸上。接着,诗人的意识回到当下生存于都市的“家”,以意识的流动幻化出一系列“不速之客”的意象:有城市中的喧嚣之“声”、浑浊之“气”、众多的“形”、纷繁复杂的“意念”,还有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蜘蛛”、“蜈蚣”、“壁虎”、“蚊虫”、“鼠害”,这些意象的组合形成了对“家”的侵扰与占有,这是在城市中迷失了本性的“家”。在此基础上,诗人的意识再次深入,“家”中“唯独没有灵牌,没有神龛”,对于灵魂崇拜、祖先崇拜贯穿于精神生活始终的彝人来说,“灵牌”与“神龛”是彝人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物象,二者的缺失意味着彝人精神家园的迷失。于是,诗人的意识流动到曾经荫庇后代、降福后人的“祖灵”,由于城市中的“家”中没有了“灵牌”与“神龛”,“祖灵”也便成为“迷路”、“晕车”、“饥饿”的了,以致丧失了灵性。综观此文,诗人在似梦呓般的意识的流动中塑造了不平凡的一组意象,并将诗人对彝族精神家园复归的强烈向往寄寓其中。

西方“意识流”创作手法主要用于小说的创作中,阿库乌雾能在诗歌创作中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意象的创造,并结合民族文化、民族生命意志进行深入探寻,且有所成,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变形意象:荒诞诡奇的诗美创造

19世纪末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为了表现西方现代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悲观主义,反映“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现代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人与自我的全面异化”^{[10]P421},往往采用荒诞、怪异、变形等多种手法来折射内心的真实、表现人们的精神状态。尽管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带有明显的西方社会的烙印,语意朦胧晦涩、模糊怪诞,但它在艺术手法上的开拓、创新与突破,对其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阿库乌雾的汉语诗歌创作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荒诞、变形的艺术手法,结合彝族传统诗歌善用比喻、起兴等表现手法元素,以独具匠心的智慧创造出众多新颖、荒诞、诡奇的变形意象。这类意象是对诗人内心情感的真实描摹,其中一些意象还表现了当现实与心灵无法契合时诗人灵魂深处的孤寂与伤感。

如《人鸟》诗中的“人鸟”、“鸟人”两个意象:

“都市里的老人/有一种特别的养老方式/设法觅一鸟/是否属于名类并不紧要/为的是日日有鸟可养/并渐渐寄情于鸟/又牢牢将鸟囚于笼里/于是鸟逐日变成人的异体/名之曰:人鸟/人逐日变成鸟的

异体/名之曰:鸟人”

诗人创造了鸟逐日异化而成的“人鸟”和人逐日异化而成的“鸟人”这两个变形的意象,揭示了人和鸟异化的原因——老人与鸟的相依为命,表现了当今社会的老年人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孤独与落寞,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当今社会,如何真正关注老年人的生活与精神需求?

诗人在散文诗《雨蛇》中,塑造了“雨蛇”这一诡奇的意象:

“雨蛇,冲濯我,浣洗我,我定能以冲濯和浣洗的方式来安身立命。雨蛇,吞食我,咀嚼我,我终会在吞食和咀嚼中脱壳。……蝮蛇猖獗的年代离开画面,画面之外,城池如蝼蚁,盘错交织的街巷开始让人兽丧失方位能力,雨蛇,最后的稻草,紧紧地连接我梦中一黑一白的飞毡。”

诗人赋予了“雨蛇”这一意象作为生活于当代社会的、精神日益贫乏的人们寻求精神救赎的“稻草”的深刻意蕴,也体现了诗人在寻求现代人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必然的痛苦与艰难。

再如《灵犀》诗中,在“天空不曾被深深凝望的云团上”“种植”的“山花烂漫”的“泪滴”,已经不同于传统诗歌和具体生活中的泪滴了,它是民族精神中“纯然如泉”的生命意志被“阳光”“无情地炙烤”后留下的感伤;《雨城》诗中,诗人塑造的“雨是长在天上的树”这一“雨”的意象,表达了诗人对洗濯城市污秽的清纯之泉的渴望,也揭示出这种清纯的力量只能植根于天空、只能来自神灵无比接近的天空。阿库乌雾汉语诗歌中类似的意象还有很多,不一而足。

阿库乌雾汉语诗歌中荒诞诡奇的变形意象,既是诗人真实心灵的外在表现,也是其诗美创造的独特体现,读之回味无穷。

俄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说:“诗歌具有一种超凡的力量,通过崇高的感觉,把人类精神向上天提升,它靠一般美丽的、鬼斧神工的形象在人们心里唤起这种感觉。”^[10]阿库乌雾的诗歌创作,正是通过一系列“鬼斧神工”的意象创造,实现着其诗歌在当下社会“把人类精神向上天提升”的超凡力量!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本文所论诗歌选自:阿库乌雾.阿库乌雾诗歌选[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阿库乌雾.密西西比河的倾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 [1]王泽龙.西方意象诗学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J].文艺研究,2006(9):65.
- [2]刘介民.比较意象诗学[J].学术研究,2004(6).
- [3][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8-29.
- [4][美]劳·坡林.诗的声音与意义[J].世界文学,1981(5):248.
- [5]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论[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49.
- [6]罗庆春.寓言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当代形态[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3):149.
- [7]邱国红.威廉·詹姆斯对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和创作实践的重要影响[J].海外英语,2011(13):256.
- [8]谭绍凯.外国文学新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9]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19.
- [10]伍鑫甫主编.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536.

Research on the modern Image of Akuwuwu's Chinese Poetry

YE Jun-li

(Culture Media and Education Science School,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00)

Abstract: Akuwuwu, a Yi scholar-type poet, created numerous novel and unique images of sophisticated appeal with artistic method of western modernism on the basis of combining the profound national cultural deposits with the concept borrowed from the western poetics of imagism. The manner of his creation embodies his peculiar experience and sincere national sentiment in the use of rational thinking about the modern cultural spirit and also reflects his deep concern about the return of national civilization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culture. For study purposes, there are three ways in this article that discuss modern images in Akuwuwu's Chinese poetry. They are ways of symbolic images, stream-of-consciousness images and deformation images.

Key words: Akuwuwu; chinese poetry; symbolic images; stream-of-consciousness images; deformation images

(责任编辑:周锦鹤)